

我的學思歷程： 全球史、臺灣史、現代性

鄭維中*



如果有人問起我怎麼走上荷治時期臺灣史這個艱澀冷僻的研究道路，我通常會回答，我是走岔了路，結果運氣好就落在這裡了。

我從大學到研究所各個關卡，可說是無關不走岔。雖然說「走岔」，是出於我自己的選擇，但我寧願說，這是因為在我的生涯中，不斷出現前人所未有的機會，而我不願放棄參與的結果。大學一年級時（1993），臺大正好解除了必修「國父思想」、「中國通史」與「英文一」的限制，我立刻改選「憲法與立國精神」、「臺灣史」與「德文一」。受惠於社會學系必修學分較少的設計，我得以一

*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

方面廣泛修讀他系課程，另一方面參與各式各樣的社團活動。大三時臺大的宿舍網路首度開通，對我的智識生活產生巨大衝擊。那幾年的電腦硬體發展神速，非親歷難以想像。大一時，個人電腦主流尚且是 DOS 作業系統，而大三時，Windows 已迅速淘汰之前的設備。同樣，大一時，BBS 正開始熱門；大三時，瀏覽器已經風行起來。大一時，閱讀國外新聞雜誌等，需至圖書館閱覽室排隊；大三宿網開通後，每日皆可無償直接瀏覽國外新聞的網站。其資訊差距，不可以幾何級數比。隨之而來的是各式學術、報刊資料庫的開通。當時有個笑話說，臺灣在戒嚴時期不能碰馬克思，解嚴後，所有的青年一窩蜂的念馬克思；中國在開放以前不能碰佛洛伊德，結果開放後，所有的青年一窩蜂的念心理分析。雖是笑話，但看看諾貝爾獎得主高行健先生的作品，還有陳映真先生的那些滿是馬克思主義術語的文章，不免覺得此言也不完全是虛。出於對過去部編本的種種懷疑，出於對大學僵化課程的種種不滿，我開始了對自我知識生活的「自力救濟」。

之所以不斷走上岔路，也多拜這種精神上的自力救濟作為所賜。如果不斷的發現之前被灌輸的知識內涵有缺陷，在尋求補足、補正的道路上，當然無法從既定的道路達到目標。再者，我仍有幸遇到當時歸國的一批新銳學者，他們胸襟較為寬廣，能容忍像我這樣在思考領域敢於亂闖的學生，鼓勵我勇敢邁進。

大學時，我對韋伯 (Max Weber) 所提出的社會學理論相當有興趣。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中，社會學理論往往被當成一種提出批判性想像的基礎。藉由研讀社會學理論，得以省思整體社會的構造，能對未來人類的社會生活有一定的想像，並藉以指導或建議人群集體的走向 (所謂「規範」導向的社會學理論研究)。這在當時風起雲湧的社會與政治運動中，受到極大的關注。在宿舍網路開放後，我不經意的發現，對於歐美的知識社群，這些思想工具早已與日常生活結合。究其原因，這些思想工具取之於其不斷演進的歷史發展，又用之於塑造未來的歷史中。於是，我開始思考韋伯社會學理論與西歐歷史的關聯，甚至是西歐社會中歷史學與社會學的分合關係。

韋伯的經典著作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，在很大的程度上，藉助了歷史檔案文獻調查的方法。而其「理想型」的研究方式，則引申自實際的歷史研究成果。在逐步廓清韋伯的思想脈絡，與各國 (尤其是戰後美國派森思學派) 採借其理論的情況後，我發現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所思考的西歐現代性 (modernity, 又譯近代性) 形成史，與十七世紀荷蘭共和國的歷史，有相當大的重疊。而這些對於現代性形成的觀察，意外的對於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東亞殖民地的研究，能有所啟發。這個意外的發現，誘引我進一步去閱讀荷蘭東印度

公司相關的歷史研究成果。此外，我在曹永和教授所開設的課程中，結識了當時到輔仁大學交換的比利時學生韓家寶 (Pol Heyns)。韓氏是法蘭德斯人，母語為比利時荷語，當然能夠閱讀當時已經出版的《熱蘭遮城日誌》。我在前述閱讀的基礎上，運用本身的德語知識，嘗試閱讀荷蘭原文，並且請韓家寶來察看我的閱讀理解是否有誤。

等我到政治大學攻讀社會學碩士時，韓家寶則決定以荷蘭時代為主題，在臺大歷史系攻讀歷史學碩士。韓家寶的論文後來出版為《荷蘭時代臺灣的土地、經濟與稅務》，我的論文則出版為《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：自然法的難題與文明化的歷程》。倘若讀者比較兩書，可以看出，韓家寶著重於東印度公司在臺灣推行經濟開發的歷程，並強調東印度公司的政策設計與唐人移民間，互利共生的關係。我的作品則延續著韋伯「現代性形成」的問題意識，想要從這樣的歷史經驗，去推導荷蘭人的殖民統治原則，對於臺灣本地社會的衝擊，以及其可能的反應。在寫作與研究本書的過程當中，我瞭解到，即便荷蘭人對於臺灣本地，純然是個遠地的外來者，他們在此地的活動，也並非僅受到荷蘭本國歷史發展脈絡的影響，而必須考慮東亞諸國間的歷史演變。同樣，「現代性形成」的論題，也無法用單線演進的方式來理解，而應該從多元互動的歷史結構來思考。

延續這個思考脈絡，我個人精神上的「自力救濟」之旅，逐漸踏上了更寬廣的亞洲史與海域史的道路。2000 年時，在曹老師八十大壽的研討會上，承蒙曹老師介紹，與包樂史 (Leonard Blussé) 教授認識。當時，我正著迷於對荷蘭時代臺灣統治機構的研究，還沒有思考到亞洲史與海域史的地步。2003 年，我在臺大攻讀社會學博士時，正逢包樂史教授推動培訓亞洲青年學者的 TANAP 計畫。在幾個候選人當中，因為我的年齡與 TOEFL 考試成績，恰巧符合標準，幸運地受到推薦參加。也由於臺大社會學研究所，一向鼓勵學生前往海外歷練，便以外派參與國際計畫的名義，同意我出國進修。在這一年中，我與其他來自印度、伊朗、新加坡、印尼的青年學者，一起接受基礎的荷語訓練、花體字識讀、東印度公司歷史經典，以及海洋史基礎經典課程。在八個月課程結束後，我運用在檔案館所抄寫的資料，完成一份博士論文提案，同時取得高等碩士 (Advanced Master) 學位與博士候選人資格。

在荷蘭修讀課程時，我發現其他國家的同學，在查找基本史料上，都著重在與自己出身國家相關的主題。但是，與臺灣相關的研究，在這個層面上，因為已有過去日本、荷蘭學者奠下的研究基礎，已經大致成形，難以有非常大的進展。再者，延續我本身對東亞海域史的關懷，禁不住去瀏覽與他國相關的史料。意外發現，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各地的商館，對於他們的對手鄭氏 (鄭芝龍、

鄭成功、鄭經)的活動與船隊的貿易情況，多有留意。這些資料，在各個商館的記載中，均非要點，但是，若能將這些零星資料聚合，則歷史上前所未見，關於鄭氏商船隊的海外發展輪廓，將能夠透過一種對手的視角，被呈現出來。藉由觀察鄭氏集團的發展，也能滿足我採取區域史觀點來關照臺灣史的宿願。

其後，我將這個想法寫成博士論文提案，也受到了審查委員會的肯定。歸國之後，我認定此一計畫明確且合理，便辦理臺大博士班停學，先完成兵役義務，為出國爭取條件。2006年，在完成兵役義務後，我與包樂史教授聯絡，他表示，雖然 TANAP 計畫已近尾聲，我同期的同學們已紛紛取得博士學位，但是後續的 ENCOMPASS 計畫，仍在進行當中，我應該趁此機會，快速完成學位。在我回臺服兵役的數年間，適逢荷蘭國家檔案館更新基礎設施。首先是所有東印度公司檔案的目錄均被電子化，並且可以上網查詢。其次，過去僅有部分檔案製成微捲，但此後，幾乎所有檔案都製成微捲。這兩項發展，大幅縮減查閱檔案的辛勞，也大幅增進了瀏覽研究的速度。我的研究並非以民族國家為單位，但這樣的研究取徑，卻頗符合逐漸受到重視的「全球史」寫作模式。

2012年，終於順利取得學位。畢業論文經過修改後，於2013年由 Brill 出版社出版。之後，我在中研院人社中心亞太專題研究中心取得研究職，並從事海洋史方面的研究。2017年，我由人社中心轉往臺灣史研究所任職。於是我從海洋史的研究道路，又岔開來，岔回了臺灣史的研究。這幾年，我將已出版有關鄭氏集團的研究暫行擱置，開始研究荷蘭人所進行的水文調查、航行辦法、海圖之間的關聯。藉此，對臺灣早期歷史發展受益且受限於海岸、海洋地理環境的實況，做出明確說明。我也從事了關於臺灣鹿皮貿易的研究，說明臺灣鹿皮如何因為國際市場的變化而忽然崛起。凡此種種，都是寄望能透過基礎史料的調查，重構與臺灣史相關的亞洲史脈絡。

哲學家康德寫作其名著三大批判時，曾經指出，為了能健全地運用理性，首先須對何謂理性所做出批判性考察。正如同觀察天體必須製作精良的望遠鏡，修築天花板必須先造堅固梯子一般，想要為臺灣島民提供能創造自我主體的歷史認識，也要先從確立與此相關的世界史、亞洲史發展脈絡才行。想必這對於人文領域的學者而言，是再也平淡不過的老生常談吧。